



圖一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六高祖初興改秦漢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新帝用丘虛孝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道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糜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脩廢起損易碑飾開會遷京北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璠其大略如此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其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於集錄可謂廣聞之益矣

治平九年閏月十六日書



圖一四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三楊君其姓尚可見其官闕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樛史呂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掾捷為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嗣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叢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速策勲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酉薨

歐陽修〈集古錄跋〉墨蹟卷的

相關問題與流傳

何炎泉

〈集古錄跋〉為歐陽修的標準書蹟，風格亦如蘇軾《東坡題跋》中所論：「文忠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故本文不再贅述書風，而將重心置於此卷的寫作脈絡與流傳。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歐陽修親筆〈集古錄跋〉（圖一），四則跋語裱於一卷，分別是〈後漢西嶽華山廟碑〉、〈後漢沛相楊君碑〉、〈唐陸文學傳〉、〈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就書法風格而言，本卷為歐陽修傳世標準作品，並無真偽上之問題。過去的討論都集中在墨蹟與文集內容的校對，對於彼此間存在的差異，尚未有人提出合理的解釋。（註一）

本文除了試圖釐清此部分外，墨蹟的流傳也會稍作處理。

墨蹟與刊本的異同

將此墨蹟與四部叢刊中《歐陽文忠公文集集古錄跋尾》（元刊本）相較，可以發現有諸多相異處，其中又以第一段〈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最為複雜，至少存在四種不同的本子。

表一中有三個本子來自四部



圖一〇



圖二



圖一 《集古錄跋尾》四則跋語裱於一卷，分別是〈後漢西嶽華山廟碑〉、〈後漢沛相楊君碑〉、〈唐陸文學傳〉、〈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叢刊文集中，真蹟本為文集中採用的正本，正本中附註存在其他本子的，整理成表格中的他本。每卷的卷末，有時會另外註明其他的版本，於此視為另一本，稱之卷末附註本。當然，表格中是簡化的作法，實際狀況可能遠較此複雜。

另外三則題跋比較單純，但存在不同的問題。三則題跋都與文集本不同，卻與各卷卷末所收的另一本內容完全一致。要釐清四則墨蹟與文集本的關係，必須先處理《集古錄跋尾》的成書過程、墨蹟流傳等問題。

《集古錄跋尾》的成書

四部叢刊本有南宋周必大的前、後序，提到《集古錄跋尾》數目，據歐陽修自述，共有四百餘篇。各篇的裱法都是碑拓在前，題跋接於後，碑與跋之間鈐歐陽修之名印，每卷都有簽題註明次第。所鈐印章或許即是墨蹟本《後漢沛相楊君碑》中所出現

的「修」字印（圖二）。當時方崧卿（註二）積極地收集歐陽修墨蹟，並於廬陵刻帖，其中共得到二百四十餘篇的跋尾。周必大也利用了這些真蹟來校訂文集本《集古錄跋尾》，發現了很多不同之處。校對過程中，只要有真蹟的題跋，都會優先收錄於正文中，文中再註明與刊本的差異處。每卷的卷末又附上每篇原來的次第。

四部叢刊本每篇跋尾的最後皆註明出自真蹟、集本、豫章石本或綿本。「真蹟」所指的是否即為當年周必大用來校對的那二百多篇的跋尾？詳數四部叢刊本十卷的《集古錄跋尾》，文末註「右真蹟」的篇數接近二百四十左右，十分符合周必大所看到的數字，故很可能就是周必大所校之本。

至於「集本」與「綿本」，則與歐陽修文集的編纂狀況有關。據四庫提要指出，歐陽修《文忠集》中，除了《居士集》為其晚年自編之外，其餘都是他人所搜

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宜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甕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崑山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尔

圖一五 歐陽修《集古錄跋》之《唐陸文學傳》，底文格線清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集出版，因此流傳著各種不同的版本，如「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宣和吉本」、「蘇州本」、「閩本」等。所以「綿本」應該就是「綿州本」，至於「集本」則不確定指哪一本，但應該是用來考訂的底本。

從四部叢刊本《集古錄跋尾》的校對狀況看來，與周必大當年校對的情況相當符合，故此本應該就是周必大根據真蹟及其他版本所校訂的本子。

《集古錄跋尾》的墨蹟

關於《集古錄跋尾》墨蹟流傳，南宋曾宏父詳載於《石刻鋪敘》中：

《集古錄》舊千卷，皆先以古帖而繫以題跋，縫用名印。雋之南來，悉棄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六十有八。內一百五十一跋，雋之所藏。樞使王蘭為鑄石豫章。分為上、下、後三帙。又十二跋亦雋所藏，十七

表一 《集古錄跋》中〈後漢西嶽華山唐碑〉，故宮墨蹟與刊本相異表

墨蹟本的位置	故宮墨蹟本	真蹟本	他本	卷末附註本
第六行十一字	仲	中		
第七行第九字	祠	祀		
第八行第七字	孝	建		
末四行	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其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於集錄可謂廣聞之益矣！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	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	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	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

跋則彼之所藏，五十五跋在周益公書樓，一十跋在張永守爽家。廣憲方崧卿合而鑄石廬陵，分為四卷。

又二十二跋在三衢汪書遠家。

鄭寺丞寅出守廬陵，蓋汪之甥，模丹以來，亦鑄石郡齋。

四跋重複，當時彙草也，間多

改竄訂正，字蹟大小不同，然

皆公親札。

今廬陵二百四十六跋，散之四

方，幸存者亦不知幾易主矣！三

衢二十二跋，亦不為汪氏有。

指出千卷的《集古錄》在北宋時一直保存於歐陽家子孫手中，後來才由歐陽雋帶至南方，當時爲了行動上的便利，都將古帖割掉而僅留下題跋。歷經戰火後約保存下四分之一，可考的題跋僅存二六八件。此處似乎將千卷的《集古錄》與歐陽修所說的四百多篇跋尾搞混，才會有「四失其三」的說法。其中一五一件歐陽雋所藏的跋尾，曾爲王藺（？～一二〇二）刻石於豫章，此刻在四部叢刊本中也出現，稱爲「豫章石本」。後來，方崧卿

廣搜歐陽修的題跋，匯集刻帖於廬陵，共得二四六件，分爲四卷。此帖於周必大《文忠集》中稱爲〈六一帖〉，四卷題跋爲其中的一部分。〈六一帖〉的刊刻除了方崧卿外，周必大本人也有參與。不過，此帖並未流傳下來。

周必大當時主要就是使用這四卷的題跋來考訂，總數有二百四十六件。由於四部叢刊本中有特別標明「豫章石本」處，可知先前王藺刻石的一百一十五件並未全數爲方崧卿所收，故周必大才會另外註明是「豫章石本」。

故宮墨蹟本的流傳

此卷在北宋時爲趙明誠（一〇八一～一一二九）收藏（圖三），前後共跋了四次，最後一次是一一二二年，時間是南渡以前。後有米芾一一〇六年的跋，從文字中無法肯定與該卷墨蹟確切的關係。韓元吉（一一一八～一一八七）於淳熙九年（一一八二）的跋（圖四）：

右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
四崇寧五年仲春重裝十五
日德父題記 時在鴻臚直舍

後十年於歸來堂再閱
寶政和甲申六月晦

戊戌仲冬廿六夜再觀

至宣歲除日於東萊郡堂
重觀舊題不覺慨然時年
四十有三矣

圖三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
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
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
刻謂雜亂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
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
也不然豈其彙那以校文集所載
多訛舛脫略是當為正而楊君碑
文集則無惟中宗作仲宗建武
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
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
又倍於文忠公今復要在公所謂君
子之壘不刊不託於事物而傳者
真知言哉三復嘆息淳熙九年
重五日潁川韓元吉書

圖四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者不同
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
跋後印本尚者六十字深諳文饒
家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
禍敗語尤警切是為世戒且其文
勢上必心注乃有辟宿又鬼若之術
而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
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云三年四月
阮望朱素記

華山碑中宗字洪出相建祥辨
之乃石刻本文似借用字小歐公
筆法也

圖五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稿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為正。而〈楊君碑〉，文集則無。惟「中宗」作「仲宗」，

「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卻乃筆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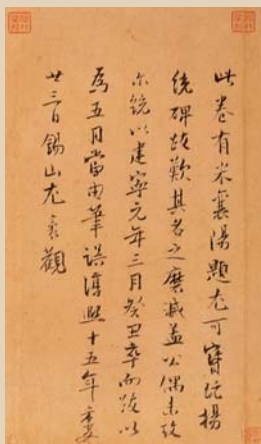
可知他曾見過歐陽修後代攜至南方的兩百多件跋尾，且如曾宏父所說，跋前的碑拓都不存。由於此卷並非傳自歐陽修後世的墨蹟，故他懷疑此四件是否為草稿？另外，韓亦指出他據以校之本子並無〈後漢沛相楊君碑〉

一文，與〈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有「中宗」作「仲宗」、「建武」作「孝武」二字之差。

三年後，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跋（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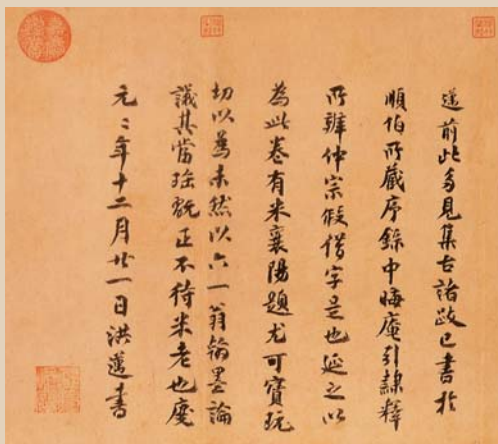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諳文饒，「處富

圖六



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此揚
後碑故歎其名之磨滅蓋公偶未改
亦統以建寧元年三月發丑李而後以
為五月當由華語清照十五年
廿三日錫山尤袤觀

圖七



述前此多見集古諸跋已書於
順伯所藏序錄中悔庵引諫釋
所辨仲宗假借字是也延之以
為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玩
切以為未然而以一翁翰墨論
議其當法既正不待米老也慶
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洪道書

貴，招權利，而好奇貪
得」，以取禍敗，語尤警
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
亦必至此，乃有歸宿。又
「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
之下，印本亦無「也」
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

正云。十二年（一一八五）
四月既望，朱熹記。《華
山碑》「仲宗」字，洪丞
相《隸釋》辨之，乃石刻
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
誤也。

他處理另一則題跋（唐李德裕平
泉草木記），發現所用的刊本比墨
蹟多出六、七十字，從「文勢」
上來，應該以印本的較正確。
對於「中」、「仲」二字，朱熹也
同意洪适（一一一七～一一八四）
的說法，認為是漢代石刻本的假
借用字，而不是歐陽修的筆誤。

接著是尤袤（一一二七～一一
九四）的題跋（一一八八）（圖八）：

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
玩。《楊統碑跋》，歎其
名之磨滅，蓋公偶未考
尔。統以建寧元年（一一
八）三月癸丑卒，而跋以
為五月，當由筆誤。

似乎是直接以碑刻來校對（後漢
沛相楊君碑），指出楊君的名字為
統，且楊統卒於三月，認為墨蹟
中的「五月」應是出於歐陽修的

筆誤。由於四部叢刊本清楚標示
著「六月」，顯然尤袤與韓元吉於
校對時所持的文集，都是缺乏此
篇題跋的版本。

慶元二年（一一九六），洪邁
亦跋（圖七）：

邁前此多見集古諸跋，已
書於順伯所藏序錄中。晦
庵引《隸釋》所辨，「仲
宗」假借字是也。延之以
為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
寶玩。切以為未然而以一
翁翰墨論議，其當寶
翫，正不待米老也。

此處提及「順伯」，即為王順伯，
稽曾筠等編《浙江通志》中有
傳。他原名為王厚之，諸暨人，
乾道二年（一一六六）進士，平
生好古博物，尤注意金石碑刻，
著有《金石錄》三十卷。由於故
宮本中上鈐有「王厚之章」（圖
八），加上楊萬里《誠齋集》中有
墨蹟本上已佚的《跋王順伯所藏
歐公集古錄序真蹟》，可知此卷當
時為王順伯所有。據楊萬里跋中
文字看來，他是與尤袤、沈揆

（虞卿）一同觀賞此墨蹟。

卷上朱熹的跋推測也是爲王順伯所書，從《晦庵集》中收錄的跋文，知兩人有所交往：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

《樂毅論》、《黃庭經》、

《東方贊》，皆昔所未見，

撫歎久之。

淳熙壬寅（一一八二）上

已，飲禊會稽郡治之西

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

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

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

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

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

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

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

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

翁。

另外，因韓元吉與朱熹兩人過往甚密，故韓跋很可能同樣是爲王順伯所跋。

此墨蹟如何從趙明誠到王順伯手上，中間過程並不清楚。李清照（一〇八一～約一一五一）《金石錄後序》中提到，他們夫妻

所有的收藏幾乎都在戰亂中失去，其中也包含《金石錄》手稿，後來李清照在看到亡夫遺著時才記下這些事。李清照此序的原稿後來也成爲王順伯的收藏，事載於洪邁《容齋四筆》中。王順伯雖然曾經收藏到與李清照相關的文物，但不知此墨蹟卷的狀況爲何。

元人有方從義（約一三〇二～一三九三）的題跋（圖九），卷中鈐有「方壺書印」。另有一方「清權」印（圖一〇），爲黃可玉齋室名印，可玉名爲石翁，卷上亦有「黃氏石翁」印（圖一一），延祐（一三二四～一三三一）中爲杭州龍翔宮住持，他與方從義一樣，都是出身龍虎山的道士。（註三）傳世很多書畫作品上都有黃可玉的跋，如本院所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舊藏本）、蘇軾《東武帖》。

至於此卷如何到黃可玉手上，其友人袁桷（一二六六～一三二七）於《清容居士集》中《跋定武禊帖》云：

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鐘鼎、篆籀、鑑銘、泉譜，侔內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一三〇七），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秘不示人。

顯然此卷與王順伯家舊藏的《定武蘭亭真本》等收藏，於一三〇七年之後散出王家，後來成爲黃可玉的收藏。隨後，方從義很可能是從黃可玉手上取得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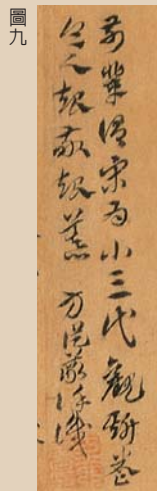
至明代，胡儼（一三六一～一四四三）跋中指出，永樂十年（一四二二）時此卷歸「秋官□□」（圖一二），惜人名已被塗去，不知所指何人。最後一跋爲李賢（一四〇八～一四六六），時間在天順二年（一四五八），李賢於《明史》中有傳。書寫引首（圖二三）的吳與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於《明史》傳中載，當他到京師時，大學士李賢推之上坐，以賓師禮事之，故此引首的書寫應與李賢有關。吳與弼的書風相當特

殊，似乎不是使用一般的毛筆，具有類似趣味的陳獻章，即出自其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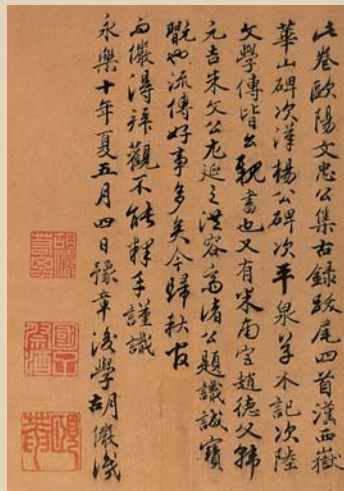
清初為孫承澤所有，後入梁清標之手，嘉慶時入清內府。此卷曾著錄於《鈐山堂書畫記》、《庚子銷夏記》、《寓意錄》、《佩文齋書畫譜》、《墨緣彙觀》、《石渠寶笈三編》等。

小結

本院所藏的四段墨蹟跋尾與四部叢刊本的關係為何？〈唐陸文學傳〉與〈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的校對狀況是關鍵。〈唐陸文學傳〉文集本中註明「集本」，卷末附錄另一「別本」，內容與故宮本一致。〈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的狀況也類似，文中同樣記為「集本」，卷末所附「別本」的內容也同墨蹟本。根據周必大的校對原則，他會以墨蹟為收錄優先，因此他顯然未見過故宮墨蹟本的這兩段題跋，否則不至於在正文中收錄「集本」。卷末出現的「別本」也不可能只是錄自墨蹟，而是來自另一個版本的



圖九



圖一〇

文集，此版本的編纂與故宮墨蹟本有關。

南宋諸跋內容已涉及及卷上三則跋尾，加上王順伯的騎縫章「王氏合章」(圖一四)，所以當時四段是裱在同一紙上。周必大於紹熙辛亥(一一九一)到慶元丙辰(一一九六)進行校對時，此四則題跋一直在王順伯手上。因此，沒有見到後面兩件的周必大，



圖一三 引首

當然也看不到裱於同卷的前兩作，這與文集中的記載一致。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在文集中註記為「真蹟」，因此周必大是見到另一個與故宮本不同的墨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於文集中亦是「真蹟」，不過在卷末提到另一本，內容與故宮墨蹟本完全相同，應該是錄自他校訂用的文集。

事實上，周必大與題跋此卷的這些文人並不陌生，且收藏者王順伯本人也與他認識，這些交往記錄都保存於周必大《文忠集》。至於為何周必大在校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時，沒有商借此四件墨蹟，確實令人不解？

此外，韓元吉於跋中懷疑這四件墨蹟是草稿，或許因為書寫的相當整齊，故不易與草稿聯想在一起。不過，根據其餘南宋諸跋的意見，此四跋應該就是歐陽修的稿本。此現象的存在牽涉到歐陽修個人的寫作習慣，周必大

〈歐陽文忠公集後序〉：

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

相當清楚提到歐陽修寫作時，由於經常修改，因此往往出現一稿多本。或許歐陽修本人對這些非定稿的墨蹟並未嚴加控管，故四處流傳，導致很多都被收錄於各個版本的文集中。類似的例子，曾宏父也曾提到，在兩百多件的《集古錄跋尾》中，有四件是重複的，他也認為這些是草稿。事實上，從〈唐陸文學傳〉（圖一五）上面的格線來看，很清楚就是草稿，歐陽修才會不按格線所畫的位置來書寫，這樣的作品當然不可能跟拓本裱在一起。至於〈後漢沛相楊君碑〉上為何鈐上印章，很可能是歐陽修原先認可的定稿，但後來又作了修正。因此，可以確定這四件墨蹟即為草

稿，不知當年是否也曾被歐陽修張貼於壁間琢磨，後來因為流傳出去反而被人保存到現在。 註

註釋

一：鈞菴，〈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四墨跡〉，《書譜》，第四〇期（一九八一），頁三六一—三七。徐邦達，〈集古錄跋〉，《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一四三。陳振廉，〈集古錄跋〉，《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北京市：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九），頁六〇五—六〇六。

二：方崧卿，字季申，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崧卿家藏書四萬卷，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編纂《韓詩編年》十五卷。其生平詳見《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六，頁一九一〇。

三：（元）劉將孫，〈清權齋集序〉，《養吾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〇，頁一。「南康黃先生可玉，可玉名石翁，世儒家，居廬山下。」（元）袁桷，〈黃可玉哀辭〉，《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本），卷一，頁七三。「延祐中，朝廷降璽書，命天師張留公主領宮事，且世襲之，而住持則黃石翁也。」（明）徐一夔，〈重修龍翔宮碑有序〉，《始豐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一，頁一四。（元）鄧文原，〈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巴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頁一〇—一一。